



胡适文学史书写的叙史策略和现实诉求

叶 李

摘 要：胡适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种“但开风气”的叙史方式——以呼应时代主题、推动现实社会变革的目的诉求对文学史进行“合目的”的建构。胡适为文学叙史背后始终有着文学史为时而著，治文学史以干预现实的目的。他把历史进化观念融入文学的进程，把“当代思想”放在白话文学逐渐演进的历史中展开，使中国文学的历史形成了伴随社会变革而朝向更进步、更现代的开放性结构，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史书写实现了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相互转化。

关键词：胡适；文学史书写；历史进化观；现实诉求

一、以时牵史 以史入时

自晚清以来的众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可谓卓尔不群。它不是一部纯学术的文学史，这一点在学界应无疑义。“五四”时期力主文字改革的语言学家黎锦熙曾指出，《白话文学史》的前身《国语文学史》是“发潜德之幽光”，“是‘文学革命’之历史的依据”，也“含有一点儿托古改制的意味”^①。何止是“一点儿‘托古改制’的意味”，胡著的要害就是为达社会革命之目的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托古改制”。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用历史上白话文学一路走强的历史验证语言变革的必要性，这与康有为托言孔子的改制如出一辙。

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及其《白话文学史》是为白话文“寻根”，为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张目，总的结论在书写之前就已设定——“大胆的假设”，书写不过是以学理探求的姿态排异求同、屈他就我的一个验证过程——“小心的求证”。胡著表面看来是历史的叙述，即以“历史的态度”叙述白话文学的历史，勾勒线索，探源讨流，揭示中国文学的演化规律，实质上是“以论带史”，即以现实的需求、主观的意图对中国文学的历史进行“合目的的叙述”，在历史进化观念的支配下设置一个白话文学与古文文学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并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评述古文文学与白话文学不可逆转的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的终点理所当然就成为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起点。

接过晚清以来社会变革的接力棒，“五四”一代结合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总结此前社会变革的成败得失，深信要建立一个货真价实的现代民主国家，必须“重估一切价值”，进行脱胎换骨、除旧布新的思想革命，重建中国的社会伦理秩序和知识价值系统。可以说，“五四”一代走的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道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所包含的基本信念为，文化改革是其它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进一步设想实现文化改革——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革的最后途径是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对宇宙和人生现实所持的整个观点，即改变人的世界观。第一个层次是改变世界观，而世界观的改变将产生第二个层次，即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变，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会促使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②胡适的中国文学史书写直接关系到林毓生所说的第二个层次，也间接关系到他所说的第一个层次。

① 黎锦熙：《国语文学史·代序》，载《胡适文集》卷 8，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5 页。

②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43、44 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句见于胡适留学日记的话，是理解其历史观或文学史观的一把钥匙。他的历史观是从生物进化论衍化而来的历史进化论或社会进化论。有这种历史进化论，他的留学日记中才有“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才能在他那篇振聋发聩的《文学改良刍议》中看到“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看到“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①，“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的断语^②。西方社会进化论一经引入并在中国传播，史学领域便“轩然大波起”，用进化论打底的“新史学”应运而生。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或可称作复古观和循环观，60年一个甲子，治乱相环，历史总是循环往复的。好的过去必将复现于未来，复古便成当然之理。顾颉刚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来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③胡适青少年时期深受进化论影响，后赴美留学，经过哲学的专业思维训练，社会进化论已经深入骨髓，成为他理解世界、应对人生、创造新知的根本信念和立言为文之本。他把“进化的观念”当作他留学时期的三种“起死之神丹”之一。他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④“求学论事”原为“观物经国”，可见胡适的“学术”自那时起便是为经邦济国而非为学术而学术。他在《国语语法概论》中说“历史的研究法”是必备的方法，又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意都不在学术本身。“三术”是“神丹”，“起死”以为“新生”的对象是老大衰朽的中国。按胡适的比喻，“归纳的理论”、“进化的观念”和“历史的眼光”是起死回生的“神丹”，而用这样的“神丹”来“整理国故”，包括整理中国文学史，岂不正是悬壶济世的义举？！究其本质，正是以政带学，以学干政。《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以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都是极好的例证。术归术，终究是要为“经国之大业”服务的。

从后来的实践看，胡适的“三术”实为二术，即历史进化观念和实用主义方法。在他看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历史进化观念，惟归纳法与清代朴学的考据方法有相近之处。他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评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举其作反例，指出张之纯及其他一些谈文学的人缺少“历史的观念”。

朱自清对文学史书写有赖于历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有比较清醒的认识。1940年代，他为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作序，指出较早的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剧曲八股文，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缺少的是‘见’，是‘识’，是史观。叙述的纲领是时序，是文体，是作者；缺少的是‘一以贯之’。”他还特别指出：“这二十多年来，从胡适之先生的著作开始，我们有了几部有独见的中国文学史。”^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被认为“有独见”便得益于他有“史观”、“史眼”和“史识”，他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来便赚得大名也得益于他有“史观”、“史眼”和“史识”。按朱自清的意思，好的文学史需有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作背景，而胡适的中国文学史不仅有“史观”，还有来自其他学科的方法——实用(证)主义的方法，当然会得到朱自清的表扬。换个角度看，朱自清是在胡适等人树立的学科规范中成长起来的，对胡适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有着更贴己的感受，更清楚胡撰中国文学史的价值何在。

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⑥，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⑦。当我们用这样的历史观看胡适的文学史书写，就会看到胡适如何通过文学史书写实现了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相互转化。一方面是“文章合为时而著”，另一方面是“文章合为史而著”，“时”牵“史”，“史”为“时”，时史合一。根据历史进化观念，胡适把“当代思想”放在白话文学逐渐演进的历史中展开，运用实证的方法，既大胆又小心地演绎白话文学逐渐演进的历史。仅有历史进化观念是不够的。林传甲和黄人等人也有历史进化观念，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史识”和处理史料的现代方法，仍被传统史学捆缚，受旧有概念限制而无以进向新境。从当下的问题意识出发，以历史进化观念和实证方法看取、剪裁、组织和整合史料，使观念与史实浑然一体，使中国文学史呈现出合规律的演进路线，这是胡适的中国文学史与林传甲、黄人等人同类著作的实质性区别所在。

胡适本人及其追随者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之所以不同于“五四”前，主要是因为他们剥除附加于文学的赘物，把历史进化观念融入文学的进程，使中国文学史真正成为有起承转合和因果逻辑联系的不进化的历史。

二、文学退化与进化的古今之辨

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一书中认为历史可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一是发生过的涉及、

①《胡适文集》卷8，第151页。

②《胡适文集》卷8，第149页。

③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第3页。

④《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2页。

⑤朱自清：《朱佩弦先生序林庚〈中国文学简史〉》，载《中国文学简史》，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第722页。

⑥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载《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第7页。

⑦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页。

影响众人的事件,二是对于这些事件的讲述(口头的,或文字的),三是讲述者对于历史事件持有的观点,他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观点、态度、方法。”^①第一个层次是客观层次,后两个层次是主观层次,主客观合成为历史。历史永远是讲述出来的历史,谁来讲述、怎样讲述永远是因人而异的。

文学与历史不可分割,文学是历史中的文学。胡适说:“要研究一事物,最好从研究它的历史开始,先了解其脉络系统,譬如研究文学,便先要从文学史入手。”又说:“我特别注重这个历史的看法,这固然是我个人的历史癖,但在当时这种新的文学史见解不但是需要的,并且是最有效的武器。”^②他认为“文学史与他种史同具一古今不断之迹,其承前启后之关系,最难截断”^③。如果没有“史观”,没有由“史观”生出的“史眼”和“史识”,就不可能产生好的文学史。自周秦以来的中国文学就摆在那里,由具有“史观”并备有“史眼”和“史识”的胡适来讲述,就能讲出与林传甲、谢无量 and 曾毅等人极不一样的东西来。作为在跨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派学者,胡适相信历史不是无数事件杂乱的堆积,其间必定存在必然的联系,史家的任务就是厘清这种联系,把杂乱堆积的历史事件整理成条理分明的动态的历史过程。正是依靠历史进化观念,用进化的历史眼光看待中国文学,胡适才能在整理作为客观存在的中国文学时显示他的史识。由于独具“史眼”,胡适看到东汉中叶以后,由于民间文学影响的深入、普遍,甚至影响到文人创作,虽逢乱世,文学史却开出一个新局面。“这纷乱的时代,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很灿烂的时代。”^④在这个时代,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致力于制作乐府歌辞,文人用古乐府的旧曲改作新词。“以前的文人把辞赋看作主要事业,从此以后的诗人把诗看作主要事业了。以前的文人从仿做古赋颂里得着文学的训练,从此以后的诗人要从仿做乐府歌辞里得着文学的训练了。”^⑤由于深具史识,胡适将古乐府旧曲《有所思》与东汉张衡、繁钦,晋朝傅玄的仿做诗对比,指出“文学的民众化与民歌的文人化”的趋势来,断言“当时确有一种民众化的文学趋势,那是无可疑的”^⑥。也是由于深具史识,从散文到白话诗的发展,胡适整理出唐以前两汉到两晋文学的总趋势。“我们从历史的大趋势看来,从民间的俗谣到有意做‘谐’诗的应璩、左思、程晓等,从‘拙朴’的《百一诗》到‘天然去雕饰’的陶诗,——这种趋势不能说是完全偶然的。他们很清楚地指点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白话文学的冲动。这种冲动是压不住的……在那诗体骈偶化的风气最盛的时代里竟会跳出一个白话诗人陶潜,这都足以证明那白话文学的生机是谁也不能长久压抑下去的。”^⑦还是由于具备历史的识见,唐以前五六百年文学的发展被胡适规整成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唐代这个文学新时代的出现,被描述为文学演进过程中如同春华秋实一般结出的文学硕果。文学的历史绝不是散乱的材料和偶发事件的集合,而是由历史细节与片段串联起的逻辑链条。说完两汉、两晋文学的白话化趋势,胡适终于要讲到唐代这个白话文学的辉煌时代了,它不是横空出世的,它是自然演进而来的,这就是“客观”的历史。“然后五六百年的平民文学,——两汉、三国、南北朝的民间歌辞——陶潜、鲍照的遗风,几百年压不死的白话化与民歌化的趋势,到了七世纪中国统一的时候,都成熟了,应该可以产生一个新鲜的,活泼泼的,光华灿烂的文学新时代了。这个新时代就是唐朝的文学。”^⑧

没有历史的观念和进化的眼光支配下的“史眼”与“史识”,很难想象中国文学的历史在胡适笔下以如此整饬的方式出现,文学的发展表现为这样合乎规律的运动。而一旦我们掌握了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在摸清文学来路的基础上,把握当下文学的发展方向,展望文学未来的去处就是顺理成章的,也是了解历史规律的人们有理由对此充满信心的。对于文学史的叙述,成为了可靠又有用的知识,它不止令我们理解文学的过去,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知识去理解文学的当下和未来。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明确宣告了他的文学史书致力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他首先要借文学史,展现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白话文学的流变是“历史”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非但如此,这个“历史”还是“发展”的——“是有很长很光荣的历史”。“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国语文学若没有这一千几百年的历史,若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这几年来运动决不会有那样的容易,决不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变成一种全国的运动,决不能在三五年内引起那么多人的响应与赞助。”^⑨在胡适高扬历史进化的观念与方法,强调文学发展的“历史”的文学史叙述中,我们还需要注意他的叙述策略。胡适虽然否定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观,但没有将之完全排斥在自己的历史叙述之外。他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将循环复古的历史观、文学退化观派给古文文学,将历史的进化与发展安排给白话文学。以复古循环的历史观念论述古文文学的“历史过程”,所以古文文学愈往后愈退化,直至穷途末路;以进

①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 2002 年,第 18 页。

② 《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241 页。

③ 《胡适文集》卷 2,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25 页。

④ 《胡适文集》卷 8,第 179 页。

⑤ 《胡适文集》卷 8,第 180 页。

⑥ 《胡适文集》卷 8,第 185 页。

⑦ 《胡适文集》卷 8,第 217 页。

⑧ 《胡适文集》卷 8,第 229 页。

⑨ 《胡适文集》卷 8,第 149 页。

化发展的历史观念描绘白话文学的“历史进程”，所以白话文学不断发展进步壮大，将要别开生面，创出新天地。其实，据实以论，古文文学又何尝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向前演进呢？当古文文学不断复古退化的历史“过程”与白话文学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一并置，就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范围内显现出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白话文学战胜、取代言文文学，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中心部分，“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①。

贯彻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的文学史必然要阐释文学发展的规律和进化的趋势。从留美期间思考中国语言文字问题到倡导文学革命再到20年代撰写文学史著作，胡适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演进趋势进行了反复阐释和论述。他明确提出文学进化观念的第一层意义就是“总论文学的进化”，指明文学的发展潮流、变迁轨迹——文学史随着线性时间的往前推移而不断演变进化，发展进步。“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有唐的文学，宋有宋的文学，元有元的文学。”^②文学随时代而发展演变的历史趋向“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③胡适在描述中国活文学——白话文学的演进时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循环观，复古退化观，坚决抛弃了其中僵化、封闭、静止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因子，将白话文学的历史描述成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样一个演进流程中各种文学现象反映不同的时代精神，具有某种不可重复性。“《三百篇》的诗人做不出《元曲选》，《元曲选》的杂剧家做不出《三百篇》，左丘明做不出《水浒传》，施耐庵也做不出《左氏春秋》。”^④胡适认为，文学进化的标志是要建设一种有情感、有思想的白话文学，取代那种摹仿古人、无病呻吟、只重形式的古文文学。他认定，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具备了这样的作用才是活文字。文言作为与封建传统思想相联系的表达工具，已不能有效地承载与表达现代思想和情感，不符合文学进化的潮流，不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建立新的现代民主国家的时代要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按照这样的公理、原则，文言作为已死的文字，绝造不出活的文学、真有价值的文学，相反，“凡是带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着白话文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⑤因此，胡适断然判定：“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⑥

三、为革命治史的现代性诉求

胡适并非以纯学者的姿态治文学史，他为文学叙史也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背后始终有着治文学史实以干预现实的目的，有着以文学史书写作为参与中国社会变革、思想文化现代转型的一种社会实践的强烈动机。这样，他对文学的历史进程和“进化”的描述不仅仅只满足于简单的直线向前的模式，而必然包含着与整个社会的变革趋势、思想价值体系重建的时代要求相应的“有意的主张”。与变革社会，改变思想文化现状的现实诉求相一致，在胡适那里，文学的历史进化不单是自然演进式的“消极”的进化形态，还具有积极激烈的表现形式。他将文学史的进化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⑦对历史进化作“演进”与“革命”的划分，当然不只单纯展示历史进化的两种形式，显示思考的细密。对于“历史”描述的精确，根本目的在于用自然演进中存在的“问题”凸显“人力的督促”的革命的必要性的重要性，以与社会现实中的变革相呼应、相支援。“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难保不退化的。有时候，自然的演进到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个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进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以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⑧虽然革命积极激烈也有效得多，但即使是现实中面对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机而应时代迫切要求进行的变革，也不可能一帆风顺，直线式勇往而前，毫无阻滞，迅速实现目标。真正有意在自然演进的缓慢历程上加上一鞭、满怀热情的人们必须对革命的复杂与艰巨，迂回与曲折有充分的认识和心理准备，才能将变革进行到底。在传达文学进化观念时，胡适很好地阐述了文学发展进程的曲折，多少有意地以之提示和映现社会、思想变革的复杂艰巨。他把进化划分为演进与变革之后，又详细地阐释了文学的历史进化的复杂情况。“文学进化观念的第二层意义是：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就可以发达完备的，须是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有时候，这种进化刚到半路上，遇着阻力，就停住不进步了；有时候，因为这一类文学受种种束缚，不能自由发展，故这一类文学的进化史，全是摆脱这种束缚力争自由的历史；有时候，这种文学上的羁绊居然完全毁除，于是这一类文学便可自由发达；有时候，这种文学革命止能有局部的成功，不能完全扫除一切枷

①《胡适文集》卷8，第151页。

②《胡适文集》卷2，第116页。

③《胡适文集》卷2，第7页。

④《胡适文集》卷2，第116页。

⑤《胡适文集》卷2，第46页。

⑥《胡适文集》卷2，第14页。

⑦《胡适文集》卷8，第151页。

⑧《胡适文集》卷8，第151页。

锁镣铐，后来习惯成了自然，便如缠足的女子，不但不想反抗，竟以为非如此不美了！这是说各类文学进化变迁的大势。”^①用积极“进化”的观念观照文学体裁的演变，胡适看到了革命的趋势：“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②胡适说演进，谈革命的立意是为了证明“故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种下了近年文学革命的种子；近年的文学革命不过是给一段长历史作一个小结束；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永永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的创作的新路了”^③。最终的旨归还是在给当代的文学革命提供合法的历史依据。

同时，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当史书者带着历史的观念，进化的眼光注视文学的演变“进程”的时候，单个的事件、零散的材料经过有意的排比罗列而产生逻辑关联，具备一种假定的历史阶段的普遍连续性，由阐释中产生出新的意义，散乱的文学观点与文学印象被整合成具有系统性的赋予了新价值的知识。胡适通过内蕴于历史进化观之中的“系统意识”对文学材料进行有意识地整理罗列，建构出一种必然性的历史逻辑，造成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社会发展、变革趋势同构的历史趋向。经由他“合目的”的叙述，中国文学的历史形成了伴随社会变革而朝向更美好，更进步、更现代的未来的开放性结构，将关于中国文学流变的知识变成了可以不断丰富、增殖，产生新意义的开放的知识系统。更重要的是，以进化论为核心建构的新史学观，存在着“把本土的历史看作世界性”的趋向，当这样的史学观念被引入文学史领域，具体化为历史进化的文学史观来建构文学的历史时，相同的趋向也不能说不存在。即本土的文学的历史也具有了世界性，不再是排除在世界性的文学发展潮流之外，而是跟世界文学的发展具有同样的进化轨迹。循此趋势，世界先进的文学的“现在”，将是中国文学发展后达致的未来，这种由进化的路向保证的未来完全是可期待的。中国文学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都被纳入了世界的体系，去追寻“现代性”的未来，无论是文学领域，还是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现在需要的就是用“人力的促进”——革命，于自然进化的历程上加鞭，促使这个美好的“未来”更早到来。

如果我们将胡适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当作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语境中的特殊文本加以分析，其具有的政治意义不难辨明。应当说，胡适治史实为干预现实，治史是干预现实之诉求在中国文学史领域的实践形式，是直接为中国社会、文化、文学的现代转型服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说起来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为改造中国的社会基础、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进行的一场政治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毋宁说是在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变革。他以指陈路向、开辟新径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呼应和支援思想革命，借以推助现代民主国家的形成，参与再造中国的现代进程，从而获得了现代品格并具有了现代形态。由于干预现实的志趣而激发治史的兴趣，这是胡适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不同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最为突出的一个标志。对于鲁迅和王国维来说，治史就是治史，所治之文学史是地道的史家之史。而对胡适来说，治史却是“主题先行”，先有政治理念后有文学史观及其文学史书写。作为中国文学史初创期形成的一种治史范式，胡适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几乎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特别是 1950 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如果把胡适这种领导标新的行为视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现代化取径，那么便可以把胡适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视为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一个特殊样本。

●作者简介：叶 李，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20110308)；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70 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胡适文集》卷 2，第 116～117 页。

②《胡适留学日记》，上海书店 1989 年，第 862 页。

③《胡适文集》卷 8，第 152 页。